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 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一九二八年日軍侵占济南的回忆	賀貴严遺稿(1)
關於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	
事件	梅汝璈(16)
短稿十篇	
郭松齡反奉側記	廖安邦(37)
蔣介石串通日本海軍幫助刘湘运軍用	
品的經過	范崇实(39)
石友三发动反张学良战争的如是我聞	蕭 勞(41)
冀察特殊化前宋哲元和蔣介石的勾心	
斗角	王式九(42)
韓复榘醞釀“山东独立”未遂的經過	韓多峯(46)
七七事变前夕的“新鴻門宴”	董升堂(51)
关于蔣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	
見聞	袁朝樞(53)
郭泰祺被蔣介石免职的內幕	楊玉清(53)
岡村宁次与孙良誠的一次談話	周永业(57)
日寇投降后岡村宁次的一个反共建議	龐鏡塘(58)
我所知道的載筭	沈 醉(61)

戴笠之离开黄埔.....粟 鼎 (170)

附 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两年工作总结报告(211)

附注

对《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六五页,第四十八辑二五〇页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八页,第三十七辑二三九页

对《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

七,二四九、二五一、二五三页,第三十七辑二三八、二四一页,

第五十五辑一九一页

一九二八年日軍侵占济南的回忆

賀貴嚴遺稿

一 日本軍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及出兵济南 和国民党軍北伐的作战部署

当一九二八年春国民党北伐軍进军山东的时候，日本軍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向我国济南发动了武装侵略。这是日本第二次出兵了。第一次出兵，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間。那时正是日本軍国主义头目田中义一組成的侵华內閣当政。他們看到蔣介石統率大軍由南京渡江北伐，便立即出兵山东，也曾侵入了济南。不过那次蔣介石因武汉政府的张发奎將軍要东征，南京受到威胁，乃将进占徐海各軍急剧南撤。因此，日本侵略軍到济南扑了一个空。但田中內閣对我国的侵略是有其深远的阴谋的。在那次出兵的同时，曾由日本外务省召开了所謂“东方會議”，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权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負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滿、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这就是田中的所謂积极政策。狂妄的“田中奏折”，也是在这时向日本天皇提出的。为了保证这一侵略政策的贯彻执行，田中內閣还对其國內反对侵华的进步人士实行了野蛮的镇压，被迫害的达千人以上，其中被扣押的达三百余人。

日本軍国主义的第二次入侵济南与第一次不同。它是看到北

伐軍从魯南向北全面推進，迫使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等殘部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才急急忙忙地發動起來的。日本內閣最初決定派第六師團全部進犯濟南。但因出動整個師團運輸不易，乃改變計劃，派該師團的齋藤旅團為先遣隊，以便迅速侵入濟南。後來看到北伐軍勢如破竹，恐怕先遣隊也不能按時趕到目的地，才又決定由駐天津的日軍中派遣三個中隊，由小泉中佐率領向濟南急進。這支侵略軍于四月二十一日到達，齋藤旅團到四月二十六日才到濟南。他們見北伐軍到了泰安，必須迅速控制濟南，就在濟南商埠大馬路、三馬路和緯一路、緯三路之間劃成東守備區，在二馬路、六馬路和緯六路、緯十路之間劃成西守備區。各個守備區都在街道交叉路口堆積沙包，設置活動電網，日軍守兵則實彈瞄準馬路上向他接近的中國人，不問你是軍人還是老百姓。這表明他們已完成了商埠的占領。至其第六師團的主力，則由福田師團長率領，從龍山徒步行軍，也于五月二日上午十一時趕到了濟南。他們以為我北伐軍如無對日作戰決心，只要發動一次小規模的攻勢就能實現其侵略野心，故于五月三日向北伐軍駐在商埠的部隊發動突然襲擊，企圖一舉而趕走這些部隊，威脅國民黨放棄北伐計劃，以實現其控制華北的罪惡目的。當然，他們是有充分作戰準備的。在福田師團入侵濟南的同時，他們就完成了名古屋第三師團的動員，並作好了戰時編組，如濟南事件發展成為正式的中日戰爭，那末，他們就會源源出動其侵略軍的。

原來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恢復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繼續北伐。接着就把參加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和與國民黨建立聯系的各軍編成四個集團軍。蔣介石兼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任

第四集团軍总司令。各个集团軍都是由其自己原来所率领的部队編成。第一集团軍計分为四个軍团和一个預备軍：第一軍团由刘峙的第一軍、顧祝同的第九軍、繆培南的第四軍編成，以刘峙兼任总指揮；第二軍团以陈焯的第二十六軍、范熙績的第三十七軍和另一部队編成，以陈調元任总指揮；第三軍团以张克瑤的第三十三軍、我(作者原名耀組)的第四十軍和夏斗寅的新二十七軍編成，由我兼任总指揮；第四軍团以阮玄武的第三十四軍、鮑剛的第四十一軍、馬文德的第四十二軍与一騎兵旅編成，以方振武任总指揮；駐在江西的第三軍王均部編为总預备軍，以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揮，但朱培德始終未就前敌总指揮职，后来只有朱世貴的第八师到了前綫。

蔣介石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从南京到徐州搞了一幕所謂誓师大会。三月底蔣再度到徐州部署軍事，向张宗昌、孙传芳等部北洋軍发动了全面攻击。这次的作战部署是这样：第一軍团位于台儿庄、韓庄之綫，向枣庄、临城、兗州之敌攻击前进；第二軍团位于台儿庄(不包含)以东，向沂水之敌攻击前进；第三軍团位于沛县、丰县之綫，向魚台、济宁之敌攻击前进；第四軍团位于碭山、单县、归德，向金乡、济宁之敌攻击前进。

第一集团軍各軍团于四月十日开始向各自的目标进攻。除了第三軍团曾在魚台地区与孙传芳部发生激战，以致在北伐战争中以勇敢著称的龔宪师长不幸战死外，其余各軍团的对敌攻击都很順利，特别是第一軍团正面之敌系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已經不堪一击。还因为从馮玉祥部借来了一列鉄甲車开路，迫使张宗昌在津浦鉄道上活动的白俄鉄甲車队抬不起头来，从而一往直前，簡直看不到敌人的踪影。故各軍都于四月二十日前后到达兗州——济

宁之綫。經過短时休整，繼續前进。第三軍团系于四月二十二日自济宁与津浦鐵路平行向北追击，通过泰山山脉各隘路驅逐穆柯寨、白馬寺之敌而进入黄河南岸平原地区。在此期間，粮食缺乏，軍行較緩。占領穆柯寨以后，我即派遣陶峙岳师长率所部第四十軍第三师为追击队，携带干粮輕装前进。沿途沒有遇到敌人，于四月三十日夜間到达济南附近，五月一日清晨进入济南城。第四軍团由方振武亲率第四十一軍和騎兵旅經汶上、肥城向济南挺进，亦于五月一日进入济南。当夜入城部队駐地如下：第一、第九两軍駐城内；第四軍初駐商埠，后又移駐新庄兵营；第二軍团駐济南东面的辛店以东；方振武部四十一軍第九十一师駐城内，第九十二、九十三两师則与四十軍第三师同駐商埠；方部第三十四軍阮玄武部則駐新庄兵营。

我的第三軍团主力，于五月一日午前到达距济南西南十几公里之党家庄。当时我判断济南既有日軍盘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軍必須有作战准备，也就是我軍与敌人之間，必須保持必要的距离。因此，决定即在党家庄附近設营。随即派參謀长謝履和所轄各部队联系，保持待机作战态势。我为了深入了解济南日軍动态，并視察第四十軍第三师的实际情形，于午后率領參謀、副官及卫队数人，亲赴济南。日軍在各重要交通路口堆积沙包，下有枪眼，上有帽堡，架着机关枪，掩体前布有活动鉄絲网，日軍在胸墙內作瞄准姿势，其步哨則放出距工事綫数十米或百米不等。我当时已意識到：日軍的这种态势，在軍事意义上說，它已經占領了济南。中日两軍的冲突势难避免。为了使我自己的部队处于有利地位，即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命令第四十軍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王校膺所屬两个营，迅速从紧靠日軍的緯一路、緯二路附近駐地轉移到商埠

西端該师师部所在地集結待命。一面准备去找第三师师长陶峙岳
筹商对策，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这时，忽聞蔣介石的总司令部也于昨夜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
办公。我初聞此訊，以为济南情况正值十分严重，总部亲来頂住，
乃是好事。繼而想到統帥部处于日軍枪口之下，已陷于被动的不利
地位，还会給所属官兵以中日两軍可以和平相处的錯覺，从而松懈
战斗意志。因此，我立即赴总部去見蔣介石，除了大略談了一下
从徐州北上以来的重大事情以外，着重說明了商埠日軍作战部署
的严重形势，提醒蔣特別注意。乃蔣听了我的話以后，竟处之泰然。
他說：日本參謀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为联络參謀，和总司令部同車
到来，已令其向日軍司令部交涉，撤除其阻碍交通的工事。当时我
的印象是：蔣介石並沒有意識到中日民族間的矛盾和日本出兵济
南的企图是怎样一回事。他好像还是同住在上海租界一样，有了
帝国主义軍警的保护，就可高枕无忧。不过，我又以为佐佐木中佐
既是日本參謀本部派出，那末，他就有权和任何一級日軍部队长交
涉，且看他交涉的結果怎样。当天午后，日方放出了和平妥協的空
气。我到普利門外視察，看到日軍果然在撤除其在緯一路和緯二
路地区所設置的障碍物。因此，我也誤认为日軍已經改变主意，放
弃武装挑衅。并由此而联想到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華盛頓會議
日本在英、美压力下归还山东半島的一段历史。現在，英、美的国际
压力仍然存在，而中国的形势也有了新的变化，日本政府改采溫和
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有了这种幻想，我对当时的危急形势，
也是抱着乐观态度，专待五月三日參加总部會議，以便按照新的計
划繼續北进。殊不知就在五月三日这一天早上，日本軍国主义者在
济南的武装挑衅就爆发了。

二 日軍在济南挑畔及其一系列的暴行

日本軍国主义者既然要阻止国民党北伐軍渡河北进，以便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企图，那末，乘国民党北伐軍尚未渡河之前在济南发动軍事挑畔，这是必然的步骤。所以日本侵略軍最高指揮官福田师团长知道蔣介石已迅速于五月一日夜間抵达济南，他就着了慌，不及等待胶济鉄路的修复，便率領該师团主力由龙山徒步行軍，二日午前赶到济南，并在当天晚上就完成了出击准备，在三日午前九时，就向靠近日軍駐扎的国民党第四十軍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动了攻击。这时碰巧第七团的团、营长都去师部开会，群龙无首，突遭袭击，以致未能进行有組織的抵抗，因而这两个营損失非常惨重，特别是第二营的官兵，不是被敌人用刺刀杀死就是被俘虏，全部都被歼灭。該团团长王校膺因为事前沒有执行我叫他轉移駐地的命令，故遭此惨敗，自知責任重大，就在事变的当天逃跑了。这次日本侵略軍所以选择我四十軍部队作为攻击对象，不仅是在軍事上要排除靠近他的障碍，以便展开全面攻势，尤其是在政治上还有一个极其恶毒的阴谋。就是：要把它这次在济南的武装挑畔塑造成英、美等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三七年前砲击南京事变的重演，以便向国际上宣传，說各国过去搞的南京事变是由于賀某的四十軍紀律不好所造成，这次济南事变同样是賀某的四十軍紀律不好所造成。企图以此来欺騙世界輿論，并緩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它的矛盾。

由于日本侵略軍向第四十軍第七团第一营进行了突袭，引起了敌我在商埠的全面战斗。四十軍第三师的主力 and 四十一軍第九十二、九十三师都进行了有組織的抵抗，特别是九十二师，因为方

振武担负了卫戍济南的任务，该师被指定为卫戍部队，预先作了战斗准备，因而对于敌人的挑衅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此时敌人受着我优势火力的制压，躲在工事后面抬不起头来。日军福田师团长看到形势不好，知道再继续战斗下去，可能激起我军正式对之作战，对它极为不利，乃改变办法，派间谍佐佐木中佐进城，恐吓蒋介石下令停火。佐佐木于下午二时许跑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大叫大嚷，硬说我军欺负日方兵少，发动了这个战斗；扬言日本国内正在动员，如果继续打下去，日中全面战争必不能免。蒋介石本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早就作了屈从妥协的打算，现在听了佐佐木的谎言欺瞒，对日军发动的突袭，竟怀疑是衅由我起。因此，他立即接受了佐佐木的要求，派了十个参谋传令班，打着命令停火的白旗，阻止我军向日军射击。入夜又严令我军驻在商埠的部队全部退出。他完全落入了福田的圈套。这就是日本侵略军五月三日在济南发动武装挑衅的主要情况。

日本侵略军在发动武装挑衅的过程中，大肆屠杀我国军民。凡是日军所至之处，我军官兵无论是在马路上行走的，在商店买东西的，在澡堂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了伤不能行动的，几乎都遭杀害。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残杀了许多非战斗人员。例如：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以下职工十七人，都惨遭屠杀。事后据唯一逃出来的张姓工人证实，日军在杀害蔡公时以前，先割去其耳鼻，然后加以枪杀。此外，日军还炸毁了我济南的无线电台，事前未提出警告，以致该局职工大多被炸死；在济南邮局避難的许多居民被日军作为俘虏，捆绑毒打。这些，都是五月三日发生的事。四日我军已退出商埠，日军借口屋内有人放枪，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又逮捕了很多居民，诬指为便衣队和

刘黑七(即刘桂棠)部匪軍,大肆屠杀。日軍对于被拘捕的我国居民則用绳子或鉄絲綑綁,不給食物。日軍还唆使其居留民义勇团寻仇报复,平日有过反日言論或取締过日貨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也被杀害了許多。据事后統計,这次被杀害的中国軍民总数达三千六百二十五人。日本駐济南領事西田在暴行发生几个月后向中外記者說:这次中国方面死亡达两千多人,这个数字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

三 日本軍国主义者玩弄的政治欺騙

日本軍国主义者估計到,他們出兵济南的侵略行动,直接和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冲突,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干涉;同时深入我国内地作战,在軍事上要以最少的兵力去战胜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因此,他們一面发动武装侵略,一面玩弄了一系列的花招,綜合他們所作的勾当,可以归納为下面三点:

(一)日本軍国主义者为了隱匿它的真实侵略的意图,极力把它这次出兵說成和一九二七年美国的砲击南京,英国的出兵上海,同样是为了保护侨民。当它发动武装侵略之初就声言,我的第四十軍有部分部队到了济南,搶劫了日商财产,杀害了日本侨民。捏造这一謊言,作为他們出兵济南的“正确理由”,并曾发动日本报纸对我大肆詆毀,把我所率領的軍队描繪得簡直不成样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时不仅日本进步人士不相信,就連日本陸軍巨头宇垣一成因看到日軍警备区和所謂搶劫地点的接近,也在他的日記中写道:“这种宣传不可思議。”日本軍国主义者发动这一宣传攻势,是为了掩飾自己的侵略罪責,矇哄美、英帝国主义者,从而緩和他們之間的矛盾。其次,是愚弄国民党的腐朽軍人,使之放松警惕,麻痹斗志,不战而屈。后来张群从日本带回这类报纸,蒋介石

即免除了我的軍職，以此去討好日本軍國主義者。

(二)日本軍國主義者歪曲事實，把他們在濟南發動的武裝挑釁，說成是偶發事件。事實是這樣：五月二日，蔣介石通過日本間諜佐佐木向福田要求拆除商埠工事，以免妨礙交通。福田對此故意避不作答，而將責任推到下面，說這是地區守備司令所作的，要由齋藤旅團長去處理。齋藤對蔣介石的這一要求，竟滿口答應，並以此來表示他們願意同國民黨北伐軍和解。這時日本的宣傳機構，在將要對我四十軍詆罵以前，竟對國民黨北伐軍贊譽了一番，說“華軍紀律很好，對日軍並无敌意，所以齋藤願意拆除工事，與華軍成立和解”。在濟南事變數月之後，上海組織的中外記者到濟南視察時，日本駐濟領事西田竟還以五·三事變目擊人的身份說：日軍接受蔣介石的意見，於二日拆除了工事，濟南問題本來就和平解決了的，萬不料因此而招致了中國兵對日本的輕視，因而爆發了這個不幸事件。還說什麼賀耀組以大官而竟逃走了，等等。西田的這一套胡言，是抹殺不了客觀事實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自己發布的文件就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日本報紙所印的文件曾刊出五月三日日軍第六師團在濟南附近的戰鬥要圖，是日軍戰鬥開始後向其上級指揮官報告的文件，附印在所謂第一部濟南事件宣傳冊子上。這張圖說明了日本侵略軍在發動武裝挑釁開始後約兩小時內的兵力配備和它向我軍進攻的實況。從當時日軍的位置看來，他們都是在二日從原來守備區拆除工事的路口出來，向第四十軍第三師第七團的一個營進攻的。它徹底證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發動的濟南事變，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有計劃的武裝侵略，他們在濟南商埠的拆除部分防禦工事，不是為了和平而是為了達到其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罪惡目的。

(三)五月三日上午八时,即日軍发动武装挑衅的前一小时,日本駐济領事西田領着日本天津駐屯軍隊長小泉和几个參謀人員,到了城內蔣介石总司令部,装扮成很“友好”的样子,詭称辞行。他們說:“济南現在已經沒有事情了,小泉即将率部回天津,我(西田)也要去北京跑一趟,特此来向你們辞行”,等等。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偵察城內我軍有无作战准备,同时麻痹蔣介石,使之不加戒备。当“辞行者”刚刚离去,侵略者的枪声就响起来了。日本軍国主义者在发动武装挑衅以后不久,又指使“日本居留民义勇团”打着白旗,到城內外我軍駐地沿途叫喊,“不要惊惶,只是誤会,弄明了就会解决的。”

四 蔣介石親逼北伐及其与馮玉祥在党家庄的会談

蔣介石在背叛革命后举行的第二次北伐,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动統治,以便进一步反共、反人民。在北伐的过程中,我曾經起过“助桀为虐”的作用。原来蔣介石在济南事变中給日本軍国主义者吓破了胆,不敢繼續渡河北进。蔣給第一集团軍所属各部下发的命令是全軍向南方撤退。当时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第一軍团的第一軍和第九軍,亦即蔣的嫡系部队,全部退至徐州;第四軍和新二十七軍退至兗州;总預备队的第三軍朱世貴师退至泰安;我的第三軍团(不包括新二十七軍,退至党家庄、泰安之間;第二軍团陈調元部退至长清以西。只留第一軍李延年团和第四十一軍邓股藻团守济南城。蔣介石所下的这个退却命令,于五日晨二时送到我的总指揮部。我看了这个命令以后,大为震惊。当即写了一封信給楊杰,間接提醒蔣介石,希望蔣改变主意。信中首先說明日本政府的目的是要阻挠中国統一,以便分而治之。接着指出日軍

在济南的举动，系錯誤地估計中国軍隊非控制津浦鐵路就不能前進。不了解北伐軍既無重兵器，所需運輸力量有限，糧食可經運河輸送，離開鐵道仍能進軍。最後說到，張學良早已表示，只要南軍渡河向天津前進，奉軍即撤出關外，促成國家的統一。否則他們不能允許閻、馮爭奪京津地盤。今我全軍向南撤退，只是無端放棄統一機會，恰恰是中了日本軍國主義者阻撓北伐、分裂中國的詭計。不僅北伐不能早日完成，而且山東日軍的撤退亦將遙遙無期。這封信送去不久，蔣介石約我進城開會。會見楊杰，他告訴我，他們已經開過會了，決定改變命令，以陳調元的第二軍團，我的第三軍團和方振武的第四軍團渡河北進。第一軍團則因已經開始南撤，所以第一軍和第九軍仍退徐州，第四軍和新編第二十七軍仍退兗州，第三軍第八師仍退泰安云云。此時我意識到，蔣介石仍把他自己的和親近的部隊南撤，而只叫和他關係疏遠的部隊北上，心中另有鬼胎，但是有了這三個軍團北進，也能迫使奉軍向關外撤退，達成全國統一局面。後來第二軍團於五月五日的主力由濟南以東渡過黃河，第四軍團的三十四軍和四十一軍則於同日由洛口渡河；第三軍團（缺新二十七軍）與第四軍團的高桂滋部則分別於七日自齊河渡河。雖然因糧食缺乏，行動困難，但渡河北進的各個軍團都很快就接近天津，給奉軍的撤退以嚴重的壓力，閻錫山、馮玉祥的部隊也迅速進占了北京。至此，北洋軍閥政府就宣告垮台，蔣介石控制下的國民黨在關內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

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武裝挑釁仍然是繼續進行着的。當我第三軍團渡過黃河的時候，曾有日本飛機低飛偵察，高桂滋部隊渡河時，還受了日軍騎兵的騷擾。因為我軍各部都能鎮定應付，毅然北進，不為所動，故敵人的牽制阻撓未能得逞。但在五月八日日軍

向我留在济南城内的部队发动了攻击，济南城当天就被攻陷，同时占领了济南附近的党家庄。

当蒋介石决定放弃继续北伐计划，下令全军南撤的时候，经我的极力反对而变更他原来的决定，使北伐军得以绕道继续北进，从而使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伸张到平、津，最后结束了北洋军阀政权的统治，这对此后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对于击破日本军国主义者阻挠北伐，扶植傀儡政权，控制华北的侵略阴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北伐的行动，为蒋介石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动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又起了助桀为虐的作用。

在这里还要附带谈一下蒋、冯在党家庄会谈的情形。我于五日上午十时左右，从济南城内回到了党家庄，这时冯玉祥的专车早已到达了，我即往车站迎接，午后三时许蒋介石在其总司令部高级人员的陪同下也到了党家庄，蒋、冯就在我的总指挥部晤见了。冯除少数卫队外，未带随员；同蒋一齐来的有：杨杰、张群、黄郛、蒋作宾、杨永泰等人。蒋同冯主要谈到第一集团军今后的行动，盼望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把奉军赶出关外。冯玉祥同意担负起这个任务。冯对日寇占领济南不甚重视，说：“只要我们占领京、津，组织统一政府，日军非自行撤退不可。”当时冯的态度就是这样。蒋、冯在我的总指挥部盘桓了一天，当夜冯玉祥宿专车中。六日晨冯离党家庄回开封。蒋介石则乘专车南下，他的总司令部一直撤到徐州去了。

五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最后通牒与蒋介石的卖国外交

前面说过，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济南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进行

了一系列的政治欺騙，使得媚外成性而又昏庸无知的蔣介石还对侵略者存幻想，在济南事变发生后連續派遣代表請求日方停战議和。五月三日派黃郛、陈韜，四日派熊式輝，五日派赵世暄，六日又派王正廷、崔士杰，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結果不是碰壁而回，就是不得要领。到了五月六日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因为：一方面国民党駐在济南附近的軍隊大都撤退，仅有两团人呆在城内；另一方面日方由大連增調的第二十八旅团和一部分空軍已經到达济南，同时在日本国内新近动员起来的第三师团也已經完成了战时編制，随时可以調来作战。所以日本軍国主义者更加猖狂，竟借故扩大事态，于五月七日早上突然宣称：济南商埠鉄路北面“坟起”的土堆下面发现有日本侨民尸体九具，另在其他地方搜集了三具，一併送往日本医院检查。当其检查时，还邀集了駐济南的英、美、德三国領事作見証。日軍首脑福田就以此为口实，于七日午后四时向蔣介石提出了最后通牒。这项通牒系交給赵世暄轉蔣介石。赵当场要求福田延长答复時間被拒絕。通牒的主要条文如下：

一、南軍須离开济南及胶济鉄路沿綫兩側二十华里以外。

一、南軍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排日行动。

一、对騷扰及暴虐行为有关之高級武官处以严刑。

一、解除与日本軍抗爭过的軍隊的武装。

一、駐张庄、辛庄之中国軍隊須在二十小时內撤退。

以上限二十四小时以内答复。

从上面这个通牒的内容看，日本軍国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要迫使国民党北伐軍离开济南和胶济鉄路沿綫，以便由日軍全部控制济南，并确保其与本国交通上的安全。事实上国民党北伐軍已經不是向南撤退，便是繞道北上，济南城内仅有两个团的兵力。这

就是說，蔣介石事前已經基本上按照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意图办了。只是日方还不了解情况而已。因此，蔣介石接到日方通牒以后并不感到为难，旋于八日上午派熊式輝、罗家伦二人前往日軍司令部作了圓滿的答复。答复的內容如下：

一、免賀耀組職。

二、濟南及膠濟鐵路二十華里以內不駐華兵。

三、被解除武裝之華兵及武裝速行返還。

四、使濟南城內的華兵安全退出城外。

五、不許便衣隊入濟南城。

這說明蔣介石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提出的主要要求都接受了。但是驕橫的日本軍國主義還感到不滿足，福田對蔣介石的答复表示拒絕，說必須無條件接受才算有誠意。接着日本內閣的頭子們也對蔣的答复表示不滿，竟于福田所提條件之外另加了一條：（一）要求蔣介石謝罪；（二）處罰方振武。他們並且不等到蔣介石的答复，便按照預定計劃于八日上午進攻濟南城，實現了他們軍事上的全部目的。這里最使人氣憤的是，昏瞶糊塗的蔣介石竟然無恥到這種地步：擺布由人擺布，賣國我自為之。就是不管日方行動如何，他自己還是忠順地履行了上述答复的條款。五月十二日南京國民政府在山東兗州舉行黨政聯席會議，蔣介石、譚延闓、李烈鈞等都出席，決定將我免職，派方鼎英繼任第三軍團總指揮，派谷正倫繼任南京衛戍總司令。我就憤而去上海作寓公，閒住了一段時期才又回到南京政府任職。

日本軍國主義者這次向我國山東濟南發動武裝侵略的罪行，總的說來，還是失敗了。第一、阻撓國民黨北伐從而控制我華北的目的並沒有達到；第二、日本和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